

清代學術思潮

何佑森先生學術論文集【下冊】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清代學術思潮

何佑森先生學術論文集【下冊】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代學術思潮：何佑森先生學術論文集. 下 /
何佑森作. -- 初版. -- 臺北市：臺大出版
中心, 2009.04
面；公分

ISBN 978-986-01-7922-4 (精裝)

1.學術思想 2.清代哲學 3.文集

112.707

98004551

清代學術思潮——何佑森先生學術論文集【下】

作者	何佑森
編輯委員會	夏長樸、林麗真、張蓓蓓、朱曉海、詹海雲、鍾彩鈞、鄭吉雄
執行主編	鄭吉雄
發行人	李嗣涔
發行所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總監	項潔
執行編輯	莊以馨
助理編輯	傅凱瑄
校對	謝雪浩、簡均儒
美術設計	江慧敏
法律顧問	賴文智律師
印製	卡樂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	2009年4月初版
定價	新臺幣1200元整
展售處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電話：(02) 3366-3993 臺北市10617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傳真：(02) 2363-6905 http://www.press.ntu.edu.tw E-mail：ntuprs@ntu.edu.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電話：(02) 2518-0207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 電話：(04) 2226-0330

GPN：1009800604

ISBN：978-986-01-7922-4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編輯委員

夏長樸

林麗真

張蓓蓓

朱曉海

詹海雲

鍾彩鈞

鄭吉雄



《何佑森先生學術論文集》出版說明

何佑森先生，安徽巢縣人，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二月十四日，陰曆庚午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於南京；民國九十七年（二〇〇八）四月九日，陰曆戊子年三月初四日卒於臺北，享年七十八歲。先生以民國三十七年離鄉負笈臺灣，入建國中學就讀，翌年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為第一屆正式招生之入學生，畢業後轉赴香港新亞書院隨錢賓四先生攻讀碩士。曾赴美國哈佛大學任訪問學人，受業於楊蓮生教授；復遊學日本京都，問學於吉川幸次郎教授。民國五十四年，應臺伯簡先生之聘，返母系任教，遂定居臺北。敷教臺大四十年間，育才無數，受業者分布海內外，多任教於各大學。先生多次受邀赴國外各大學訪問演講，蜚聲士林，研究有清學術戛戛獨造，引領「實學」、「經世」思潮，尤為學術界樂道。民國七十七年獲香港大學聘為客座教授，後復三度受聘為香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民國七十九年及八十二年，兩度受聘擔任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諮詢委員。八十三年及八十五年兩度榮任胡適講座教授，旋又榮獲八十五年度國科會人文類傑出研究獎。民國八十六年自臺灣大學榮退，旋即獲聘名譽教授。可謂實至而名歸矣。

先生天性耿介，意氣自如，然不擅治生，故早歲飄蕩，備嘗艱苦。自任教臺大後，安定之餘，益珍重所遇，銳志於學術，於經史百子無所不窺。專治中國學術思想，尤精於近世儒學史；讀書達旦，數十年不輟。喜以稿紙作蠅楷筆記，新舊稿雜陳，積數十年而盈數尺。先生平生以一「實」字自許，與師友交率直言無隱，而文筆溫厚，向不與他人較論是非。行誼以厚根柢、厲節操為先，尤謹於辭受取與之際。淡泊榮利，唯專致於教育，課堂講授，根柢文獻，不為空言。喜求意義於文字章句之外，上下古今，四通八達，不為鉅釘瑣屑，又喜將抽象之觀念，落實於現實歷史與人生問題討論。其畢生學術思想之進程，約可分三階段：早歲受臺伯簡、錢賓四諸大師啟發，實事求是，出入經史，考訂藝文，於學風地理分布及清儒學術思想有堅實之研究；中年著意精微，析論學術流別分合，深探近世學人宗旨同異；晚歲有深造獨得之境，致力於開創風氣，從人人可見之文獻中，闡發他人未及注意之問題與觀念，如「虛實之辨」、「反權威」、「平等思想」、「器」、「一體」、「生命」等，冀為新時代昭示新方向；其「一

體」思想強調知識之整合，尤洞見當代學術分科分歧之弊。蓋先生之學，根碩葉茂，卓然一家，可無疑矣。

先生龍德潛藏，厚積薄發，窮思冥索，不自表見，畢生撰著論文數十篇，或刊或否，散見各處。逝世後，弟子夏長樸、林麗真、張蓓蓓、朱曉海、詹海雲、鍾彩鈞、鄭吉雄等亟議成立編輯委員會，刊佈遺著。爰自民國七十餘年，受業洪國樑始為先生設立檔案夾，集存所刊論文；越數年，鄭吉雄踵其事，先後哀輯先生手稿四十餘篇，陸續製成電子檔案儲存，復比較內容，考訂年月，釐析同異，編訂目錄，集成初稿。先生逝世後，詹海雲將篇幅龐鉅且含大量圖表之論文數篇，送交專家重新製版，納入集中；朱曉海復自國家科學委員會檔案中蒐得遺稿數篇。編輯委員會重加研考，汰其重複近似，計前後檢輯已刊未刊之文稿凡四十六篇，由各委員分任校讎之責，並由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傅凱瑄、謝雪浩、簡均儒同學協助文字校對。於是整合全稿，分類編次，統一體例，輯為《儒學與思想》、《清代學術思潮》二種，合為《何佑森先生學術論文集》上下冊，交付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梓行。

先生撰文，向喜以淺白生動之語辭，析論繁複深奧之玄義，述理之邏輯性尤強，情感則時溢於筆端。諸篇撰寫格式、引文方式既隨宜變動，不盡一致，所據文獻版本復前後不同。故編輯委員會決定於文稿形式，不加改易；文稿內容除明顯訛誤之外，不作補訂，亦不別據其他版本，增減修訂引文，俾忠於原貌，留存風采。先生之歷年行事，別見《論文集》最末附錄之〈先師佑森先生學行事略〉，以及同時出版之《何佑森先生紀念論文集》（大安出版社出版）卷首輯錄之〈何佑森先生行誼著述簡表〉；至於學術思想之進程，《紀念論文集》中復有〈何佑森先生學術思想之發展〉一文，併請讀者參閱。

《論文集》上冊《儒學與思想》第一至第六篇屬於先秦儒家、中國學術史通論、秦漢思想三主題，第七至第十一篇屬於近世儒學及朱子思想之研究，第十二至十八篇泛屬先秦至宋元文學與文獻之研究。下冊《清代學術思潮》第一至第十篇屬於通論，尤著重朱子思想與清代學術之關係及明末清初學風轉變兩大課題；第十一篇以下至第二十八篇，略依著述年份先後編次，以見清代學術與思潮之發展。諸篇篇末均附撰述年份及發表處所等相關資料，以便查考。

全書整理完竣，爰略述先生事略、編輯始末及凡例如上。讀者幸督焉。

《儒學與思想》——何佑森先生學術論文集（上）

目次

出版說明·····	1
孔子的生平及弟子·····	1
中國二千五百年以來的「清議」·····	37
歷史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觀念——「勢」·····	47
中國歷史上的尊孔與反孔·····	59
論「大一統」·····	65
秦漢的「大一統」思想·····	69
論「變化氣質」·····	77
近代思想史上關於體用問題的爭論·····	95
近世儒學中有關生命的幾個故事·····	107
朱子的實際人生磨鍊·····	115
朱子學與近世思想·····	125
兩周文學——上篇：《詩經》部分·····	129
周代散文的發展·····	167
兩宋學風的地理分布·····	183

元代學術之地理分布·····	211
元代書院之地理分布·····	271
《元史·藝文志》補注(經部)·····	311
《元史·藝文志》補注(史部)·····	373



《清代學術思潮》——何佑森先生學術論文集（下）

目次

出版說明·····	1
近三百年朱子學的反對學派·····	1
論「形而上」與「形而下」——兼論朱子與戴東原·····	11
朱子學與清代學術·····	25
明清之際學術風氣的轉變及其發展·····	47
明末清初的實學·····	75
中國近三百年「經世思想」中的一個基本觀念——「器」·····	89
清代的反權威思想·····	103
清代經學思潮·····	115
清代經世思潮·····	131
清代漢宋之爭平議·····	147
清初學者對於孔子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163
清初的學風·····	173
清初三大儒的思想·····	187
黃梨洲與浙東學術·····	195

黃梨洲晚年思想的轉變·····	209
顧亭林與黃梨洲——兼述清初朱子學·····	221
顧亭林的經學·····	237
《日知錄》札記·····	263
顏習齋和李恕谷的學術異同·····	273
清代中葉學術發展的趨勢·····	301
論戴震「以理殺人」說的歷史意義·····	329
錢大昕的學術淵源與要旨·····	347
阮元的經學及其治學方法·····	373
龔定菴的思想·····	397
陳蘭甫的學術及其淵源·····	413
朱一新對清代學術人物的批評·····	443
胡適論史學運動·····	465
錢賓四先生的學術·····	471
附錄——先師佑森先生學行事略·····	479

近三百年朱子學的反對學派

一、序論

任何一學派思想的發展，最後必定會產生流弊，這是很自然的一種現象。其中流弊少的遺害小，流弊多的遺害大。從古到今，很多學派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找出很多這樣的例證。當然，史實證明，朱子學是屬於流弊少遺害小的一種學說。

流弊的大小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不然不會出現所謂的反對學派。當一種學說受到批評的時候，這要看此一學派的思想，能不能經得起考驗，能不能因時制宜，能不能在態度上接受批評和指摘，能不能自我反省和檢討，能不能即時地加以補偏救弊；最壞的是不能擇善固執，不能細心考慮反對學說給人類帶來的不良後果，不能從不同學說中截長補短。今天，反對學派的人說研究朱子學的人所講的「理」字是一件殺人的武器。問題是：我們自己也要檢討，要用什麼方法能說服或改變他們這個觀念呢？又如何消除近三百年來的反對學派對朱子學的輕視和敵視的心理呢？

近三百年朱子學的反對學派和宋明思想有很深的淵源。在宋代，講功利的永嘉和永康學派，都是朱子學的反對學派。永嘉的葉適（公元一一五〇年至一二二三年）、永康的陳亮（公元一一四三年至一一九四年），在「務實不務虛」^{註一}的主張下，「要以適用為主」^{註二}的「事功」和「實學」，以反抗朱子的心性義理之學。這一點和清初顏元（公元一六三五年至一七〇四年）的言論非常接近。不過朱子學後來經過黃震（公元一二一三年至一二八〇年）和王應麟（公元一二三三年至一二九六年）的修正和補充，充實了經史的內容，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元明兩代的朱子學和科舉考試結下了不解之緣。到了十七世紀，顧炎武（公元一六一三年至一六八二年）得到黃震《黃氏日鈔》的啟發，閻若璩（公元一六三六年至一七〇四年）深受王

註一 《水心文集》卷二十九。

註二 《龍川文集》卷二十，《與朱元晦秘書》。

應麟《困學紀聞》的影響，兩人專從經史實學一線發展。又過了將近一兩百年，閻氏開創了十八世紀的「漢學」風氣，顧氏開創了十九世紀的經世學風。從表面上看，「漢學」中的「徽州學派」，似乎是朱子學的反對學派；實際上，徽州的「實事求是」的漢學，仍然繼承的是朱子學的傳統。

我非常贊成傅斯年先生（公元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五〇年）的意見。他說：

自今日觀之，清代所謂宋學，實是明代之官學；而所謂漢學，大體上直是自紫陽至深寧一脈相行之宋學。^{註三}

傅先生所說的「明代官學」，指的是明代政府科舉取士的朱子學，亦即顧炎武等很多清初學者所極力反對的八股和帖括，^{註四}不是真正的朱子的義理之學。他所說的「漢學」，指的是朱子到王應麟一脈傳到清代的訓詁考據之學，不是自立門戶與宋儒義理相對抗的漢學。在清代，學者為漢宋各爭門戶，吵得面紅耳赤，方東樹（公元一七七二年至一八五一年）的《漢學商兌》，江藩（公元一七六一年至一八三一年）的《漢學師承記》，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寫出來的，當然還有其他許多多講義理考據爭論漢宋是非的文章；而傅先生從學術思想的發展上，一語就道破了其間的傳承關係，解開了百年難解的死結，這一點實在令人佩服。梁啟超先生（公元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二八年）深信的是漢學家的治學方法，提出了另一個不同的觀點，他以為「清代思潮」是「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註五}這一句話劃分了漢學和宋學的界限，二十世紀以來，很多學人受了這一觀點的影響，恰好這時又正是西方思想在中國才開始萌芽時候，大家很羨慕科學方法，認為漢學家用客觀的態度做學問的方法非常科學；相反地，認為理學家太過於主觀、武斷，結果掀起了所謂科學與玄學的論戰，而相信科學的人，於是搖著漢學的旗幟，大反理學，大反道德的傳統。在理學家，朱子最受人的注目，所以近三百年來，凡是有反對學派的出現，第一個受到猛烈攻擊的就是朱子。我總以為梁先生用的「反動」二字，太過強烈。本來，學術有生命一如人之有生命，世世代代的血統一脈相傳，我們怎可以將一脈相沿的生命一刀兩斷，硬說他們是絕不相干呢？

註三 《傳孟真先生集》第三冊，《性命古訓辨證》。

註四 《日知錄》卷十六（臺北：世界書局）。

註五 《清代學術概論》。

平心而論，反對學派對朱子學的批評愈嚴厲，愈能為朱子學帶來發展的生機。從言論的表面看，這些反對者的確是朱子學的敵人；然而對朱子學的貢獻而言，他們應該算是朱子的誦友才是。以下我嘗試介紹和分折近三百年的「顏李學派」、「徽州學派」、以及「胡適學派」等三個反對朱子學派的學說。

二、顏李學派

十七世紀的顏元（公元一六三五年至一七〇四年）是「顏李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反對程朱最為激烈，曾經將程朱比作楊朱墨翟，看作是異端。他說：

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註六}

又說：

今日之信程朱，猶戰國之信楊墨。吾謂楊墨道行，無君無父；程朱道行，無臣無子。^{註七}

顏元特地寫了《朱子語類評》專評朱子，一條一條地批評得朱子一無是處；很像毛奇齡（公元一六二三年至一七一六年）的《四書改錯》說朱子的《集註》無一不錯一樣。顏氏說朱子教人「半日讀書」，^{註八}害得讀書人吃了砒霜卻不自知，結果每個人都變成了「白面書生」，脆弱得像婦人女子，^{註九}「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註一〇}既不願謀生，也不能辦事，^{註一一}長此以往，「卒致普地庠塾無一可用之人才，九州職

註六 《顏習齋先生年譜》。

註七 同註六。

註八 《朱子語類評》。

註九 《習齋記餘》卷一。

註一〇 《存學編》。

註一一 《習齋先生言行錄》。

位無一濟世之政事」，^{註二}弄得「四海潰弱，何有已時」，^{註三}顏元眼看朱學造成今日如此慘境，真的痛恨到了極點，於是公然宣稱，王學殺人，朱學也殺人。他說：

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不殺人耶？果息朱學而獨行王學，不殺人耶？^{註四}

顏元的言論近於宋代「永康學派」的陳亮。他的批評，有三點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半日讀書」是明代高攀龍（公元一五六二年至一六二六年）的意見，不是朱子的主張。^{註五}

第二、《朱子語類評》評的是《語類》「訓門人」類，不是全書，而且又經過仔細地挑選，不完全是朱子的意思，有斷章取義的嫌疑。

第三、顏氏提倡的實學、實行，全都是朱子平日教人不可忽視的工夫，不能算是新的創意。

實際上，顏元說的是眼前事，罵的是眼前讀書人，反對的是流行在當時社會民間「泰州學派」的王學。因為在明代末年，假道學的空疏不學，橫行無忌，直接地加速了明代的亡國，間接地使朱子學成了代罪的羔羊，如此的後果都是泰州學者始料所不及的。顏氏和同時期的顧炎武、黃宗羲（公元一六一〇年至一六九五年）、王夫之（公元一六一九年至一六九二年）等，都有著同樣的感受，他們懷著「愧無半策匡時艱，惟餘一死報君恩」的悲憤心情，每個人運用不同的方式，對李贄等一輩泰州學者所造成的風氣，無情地給予猛烈的攻擊。^{註六}顏氏生長在陽明學極盛的時代裡，朱子學在當時又尚未復興；而他生平又極佩服宗朱學講經世的陸世儀（公元一六一一年至一六七二年），他有一封給太倉陸桴亭（即陸世儀）的書信，誠懇地說出了他心中的仰慕。從這一點看，我們想不出他反對朱子學的任何理由。更何況當他到了晚年，他的學生李塨（公元一六五九年至一七三三年）向他建議，勸他多留意心性之學，他也欣然地接受了；《年譜》記載他晚年重讀

註一二 同註九，《禮運》。

註一三 同註一〇。

註一四 同註九，卷六，《閻張氏王學質疑評》。

註一五 拙著：《顏習齋和李恕谷的學術異同》，《文史哲學報》十八期。

註一六 同註四，卷十八，「李贄」條。

《朱子遺書》，這已足夠顯示了他在早年反對朱子學的悔意。所以說，他早期論學對朱子的不滿，其真正的對象可能不是朱子，而是出現在他眼前的許多空言心性的人物。今天我們討論這件「半日讀書」的公案，已無太大的意義；最重要的，我卻認為是顏元在《四存編》中所主張的積極用世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否能刺激朱子學的發展，使朱子學是否能適應一個新時代的變局？倒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三、徽州學派

十八世紀的戴震（公元一七二四年至一七七七年）是「徽州學派」反對朱子學的代表人物。他和錢大昕（公元一七二八年至一八〇四年）都長於天文曆算，認為這是研究經學的基礎知識。運用天文曆算的方法，考證記載在經書中的文物典制，這是他們所稱的「實事求是」之學。實事求是之學也稱「實學」，不同於十七世紀的「實學」，前者重古代，而後者重現代。也不同於朱子的「即物窮理」，在漢學家看來，一重實，而一重虛。古來讀書人沒有一個承認自己的學問是空虛不實的，漢學家與宋學家也不例外。他們相互指摘，從此就引起了一場虛實之辨。^{註一七}他們幾乎為這個觀念爭論了達一百餘年之久。其中曾國藩（公元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七二年）的意見比較折中，他不同意漢學家「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的批評；他認為戴氏的「實事求是」，亦即朱子的「即物窮理」。「事」是實，「物」也是實。陳澧（公元一八一〇年至一八八二年）也認為，戴氏之學只是在朱子的注疏和訓詁之學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發展，一是精深，一是博大，並沒有什麼衝突。

戴震批評朱子最尖銳的問題，莫過於理欲的善惡之辨。他在《與某書》中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又說：

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天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下，而在下之

註一七 見拙著：《清代漢宋之爭平議》，《文史哲學報》二十七期。

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註一八}

戴氏的意思是說，理不能離情離欲，離情離欲的理不是理，只是意見。在清代初年，滿清政權尚未獲得充分的支持，統治者為了緩和知識分子不滿的情緒，首先就將朱子學列為官學，以表示他們對於孔子以來傳統儒學的尊重；可是部分的知識分子仍然在文字上表現了強烈的反抗意識，消極地不承認外來勢力統治的事實。在清初的皇帝中，特別是雍正（公元一六七八年至一七三五年），以「尊者」「貴者」的地位，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字獄運動。雍正一面在推廣朱學，一面卻又操刀殺人。他將手執殺人的武器，披上「理」的美麗外衣，對於成千成萬忤逆不順的「卑者」、「賤者」，任意地砍死在他的「意見」之下。戴震早年親眼看見這些悲慘的事實，痛心朱子學受到皇帝的歪曲和利用，覺察到「以意見為理」使人無可抗拒的力量，同情普天下一人民的共同情欲受到漠視，於是他寫了一部《孟子字義疏證》，喊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的口號，希望滿清的皇帝和官吏們，不要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要再忽視人民最基本的欲望。^{註一九}

人的欲望，如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朱子也承認它是善的；如果人欲中夾帶了一些害人的私意，那麼這個情欲就變成惡的了。朱子和戴震都反對這種私情私欲，問題就出在「存天理，去人欲」的「去」字上。反對的人說成是無欲，贊成的人認為去欲是去掉那些不合天理的私欲。在宋代，除永康的陳亮和朱子意見不同以外，這兩句話並沒有引起特別的爭論。一直到了十七世紀，這時的世局變了，政權也轉移了，讀書人的思想言論的自由也失去了，人民在圈地裡討生活，最起碼的生活慾望也給剝奪了。而康熙（公元一六五四年至一七二二年）和雍正皇帝卻高高在上，嘴裡捧著朱子，一切失去理性的作為等於是在利用朱子。這時受刺激最深的是王夫之和顏元等一些知識分子。從眼前的慘酷事實中產生了一種自覺，他們認為一切問題就出在天理人欲這個觀念上面。

註一八 《孟子字義疏證》。

註一九 章炳麟《文錄初編》〈釋戴〉云：「戴震生於雍正末，見其詔令論人不以法律，……令士民搖手觸禁，……震自幼為賈販，轉運千里，復具知生民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奮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言欲不可絕，欲當即為理者。」又《劉漢微言》云：「戴氏……生當雍正乾隆之交，見其詔令論人，概介程朱緒言以執法，民將無所措手足，故為《原善》、《孟子字義疏證》，斥理欲異實之謬。……其所訶固在此而不在于彼也。」按：胡適論述理欲的意見，實源自章氏。

多少人看輕人欲，駭怕人欲橫流，這是受了宋學的影響。朱子也不認為人的基本欲望是壞的是惡的，不然他也不會推行「常平倉」的制度以解決人民糧食的需要，只是朱子在欲字上未曾詳說，因此才使後人對人欲的含義產生了懷疑。

王夫之和顏元肯定了人欲的價值，覺得天理人欲沒有什麼輕重之分。天理就是人欲，人欲就是天理。重欲輕理，或是重理輕欲都是不對的。王氏顏氏和朱子對欲字的認識並沒有什麼顯著的不同；唯一不同的是人欲的地位給提升了，價值給肯定了。他們對欲字的看法，後來間接地影響了戴震在這一點上作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章學誠（公元一七三八年至一八〇一年）很推崇《孟子字義疏證》，但不滿意戴震反對朱子的態度，認為他的心術有了問題。^{註一〇}戴氏的思想淵源於朱子，他不可能跨越朱子的義理，擺脫朱子的《四書集注》，用他所謂疏證字義的方法，一步就能走進孟子之門的。

朱一新（公元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九四年）是第一個批評《孟子字義疏證》的學者，^{註二}從他的批評中，我們很容易了解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朱氏認為人欲不是天理，他說戴震最根本的錯誤是將理字講錯了，將欲字說壞了。他說：

東原誤以人欲為天理，宗旨一差，全書皆謬。

朱氏認為欲有善惡，程朱恐人縱欲，所以專舉惡者，而不說善者。

古書凡言欲者，有善有惡，程朱語錄亦然，其教人遏欲存理，特恐欲之易縱，故專舉惡者言之，烏可以辭害意？

理欲對言，則理是善，而欲是惡。

欲本兼善惡言，宋儒苟嘗謂欲有惡而無善，特理欲對言，則理為善而欲為惡。

註二〇 《文史通義·答邵二雲書》（臺北：國史研究室）。
註二一 朱一新論戴震部分見《無邪堂答問》。